

# 略论金末战马的供应与马政

孙建权

[内容提要] 战马对于以武力立国的金朝至关重要。金卫绍王大安三年,蒙古开始大规模进攻金朝。不久,辽东、冀北大片领土落入蒙古人之手或脱离金朝统治,金朝战马的供应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形势。随着金宣宗“贞祐南渡”的完成,金朝战马供应形势每况愈下,后虽经宣宗、哀宗两朝的努力,但收效甚微。金朝的灭亡也就在所难免。

[关键词] 金末 战马供应 马政

[中图分类号] K245 K2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5241 (2010) 03 - 0059 - 06

战马与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兴衰有着很大联系,对女真族建立的金朝自然也是如此。从卫绍王即位(1208)至金哀宗自杀殉国(1234)的二十余年里,史学上一般称为金朝末期。笔者认为金朝的灭亡和金朝末期战马匮乏的事实息息相关。而对此学术界尚未见有专文进行探讨,笔者拟对金末的战马供应与马政进行考察,希望诸位方家批评指正。

## 一、卫绍王与宣宗时期

在卫绍王与金宣宗时期,金朝群牧之地被蒙古军、蒲鲜万奴叛军占领。群牧之地的丧失导致了金朝再也无法重整骑兵同蒙古骑兵抗衡,从此不可避免地走上了亡国之路。

### (一)金朝战马供应的空前危机

章宗朝在北部边境建立壕障之后,金朝对鞑靼诸部的战马贸易就基本消失。金朝战马的主要来源基地是十二处群牧所,都分布在金朝的西北边疆地区以及今天的东北地区。金朝的群牧所因靠近蒙古边境而易遭攻击,而蒙古军在对金开战后的军事动作就是针对着金朝的群牧所。

大安三年(1211),蒙古军大规模南下攻金。面对蒙古军的进攻,卫绍王遵循惯例征马做战争准备,三月,“括民间马,令职官出马有差”<sup>①</sup>。崇庆元

年(1212)五月又“括陕西马”<sup>②</sup>。

蒙古军在乌沙堡击溃金军主力后,兵分三路:中路军为主力,进攻中都;右路军沿云内、东胜、武、朔等州南下袭击西京;左路军掠取桓、昌、抚等州。九月,中路军抵中都城下。冬十月,左路军以契丹人耶律秃花为向导,“袭金群牧监,驱其马而还”<sup>③</sup>。史称蒙古军这次获得金朝“监马几百万匹,分属诸军,军势大振”<sup>④</sup>。桓州群牧所的战马大量被蒙古军掠为己用,对金朝打击很大。

至宁元年(1213),蒙古军再次南下,哲别统军克居庸关,围中都。八月,中都发生政变,纥石烈胡沙虎杀金帝完颜允济,迎立升王完颜珣。九月,完颜珣即位,是为金宣宗。贞祐二年(1214)三月,宣宗对蒙求和,“奉卫绍王女岐国公主及金帛、童男女五百、马三千以献,仍遣其丞相完颜福兴送帝出居庸”<sup>⑤</sup>。五月,金宣宗迁汴。六月,蒙古三摸合、石抹明安等率军围攻中都。贞祐三年五月初二,坚守近一年的中都城被蒙古军攻破。中都一失,金朝领土被蒙古军拦腰斩断,东北与中原首尾不能相顾,从此再也无力恢复北部疆土,唯有依托潼关、黄河一线苟延残喘。随着蒙古军攻占辽西地区、耶律留哥反于辽东以及之后的蒲鲜万奴据辽东自立,金朝对东北地区已基本失去控制,<sup>⑥</sup>随之而来的严重后果是金朝丧失了拥有多年的群牧所。西北、东

北、冀北领土的丧失,导致金朝再无适合繁殖战马的地域,金朝不得不主要依靠步兵进行对蒙作战。贞祐三年秋,金廷加强汴京守备力量,“增步军万人,戍京以西,四万人戍京以东。选陕西骑兵二千,增京畿之卫”<sup>⑦</sup>。此次所增京城卫戍部队中,骑兵计2000,步兵共计50 000,骑步兵比例为2000:50 000=1:25。

## (二)宣宗缓解战马供应压力的措施

为解决战马不足的燃眉之急,金宣宗在贞祐二年“冬十月甲午,诏遣官市木波、西羌马”<sup>⑧</sup>。这次市马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金朝的战马不足,于是金宣宗于次年五月大胆舒缓财政压力,“诏削纳马补官恩例”<sup>⑨</sup>。贞祐三年七月,为暂时缓解战马不足的压力,金宣宗下诏“括民间骡付诸军,与马参用”<sup>⑩</sup>。是年,宣差都提控完颜从坦在受命援救中都途中上书宣宗论利害,其中有一条建议金宣宗趁战事暂歇抓紧时间进行战马繁殖:“河南、陕西调度未急,择骑军牝马群牧,不二三年可增数万骑,军势自振矣。”<sup>⑪</sup>由此可知,金朝在蒙古军南下后战马供应不足导致的军势不振的窘困处境。为从根本上缓解战马供应不足的压力,金朝试图在河南地进行战马繁殖。由于前线战事方殷,宣宗无法利用骑兵中的牝马,只好以民间瘦马充数,以完成马匹的繁育。同年十一月,宣宗“诏市民间挽车羸疾牝马置群牧中,以图滋息”<sup>⑫</sup>。然而,正如王曾瑜先生指出的,在古代技术条件下,黄河以南地区很难进行良马的繁育。<sup>⑬</sup>在这里需要补充的是,金朝当时面临的不仅是技术问题,而且有客观不允许的因素存在——金朝河南地土壤不肥沃。金代黄河水患严重,据《金史·河渠志》记载,仅仅在大定年间,黄河便决口了六次,且每次决口的时间相隔几乎都不过三四年。<sup>⑭</sup>至章宗时期,黄河泛滥成灾愈演愈烈。“在金一代,黄河多次泛滥,以致沿河人民蒙受巨大灾难,使大面积良田变为荒地。而黄河决口的不断向西转移,更是加剧了灾情的恶化。”<sup>⑮</sup>金朝后期,由于战事方殷,金廷已无力治理黄河,甚至还一度曾想将黄河改道北流以作为军事防御的天堑。<sup>⑯</sup>随着黄河决口地点的不断向西迁移,金朝河南地的土壤也随之渐渐沙地化、盐碱化,杂草一类植被的生长并不繁茂,根本没有繁殖马匹的水草条件。此外,金宣宗南迁汴梁后,大批军户也随之迁来,导致金朝“户口日耗,军费日急,赋敛繁

重,皆仰给于河南”<sup>⑰</sup>,金廷统治者乃千方百计招徕流民复业种田,<sup>⑱</sup>并多辟水田以增加粮食产量,故而河南地之中能作为牧马之地者也实在是少之又少。<sup>⑲</sup>

兴定元年(1217)三月,宣宗又下诏回收溃军之马,“定民间收溃军亡马之法,及以马送官酬直之格:‘上等马一匹银五十两,中下递减十两。不愿酬直者,上等二匹补一官,杂班任使,中等三匹,下等四匹,如之。令下十日陈首,限外匿及杀,并绞。’”“又遣官括市民马,立赏格以示劝,五百匹以上钞千贯,千匹以上一官,二千匹以上两官。”<sup>⑳</sup>在金末战马供应锐减的情势下,这些亦都是无奈之举。

然而即便在金朝战马供应如此紧缺的情况下,金朝官吏依然存在着不法行为。贞祐三年,尚书右丞蒲察移刺都“与上京行省蒲察五斤争权,及卖隆安战马,擅造银牌,睚眦杀人,已而矫称宣召,弃隆安赴南京,宣宗皆释不问”<sup>㉑</sup>。元光元年(1222)三月,“尚书右丞徒单思忠以病马输官,冒取高价,御史劾之,有司以监主自盗论死,上顾惜大体,降授陈州防御使”。<sup>㉒</sup>金宣宗的纵容,无疑使得这种腐败之风得到了滋长,金朝战马供应形势变得更加严重。

## (三)木波叛金对金末战马供应的影响

金朝后期另一个重大马源基地——木波,在宣宗兴定元年叛金。叛金的起因大概是金朝之前与木波市马时“所遣官或抑其直,或以势陵夺”,“遂失其和”<sup>㉓</sup>。

兴定元年八月,“戊申,陕西行省报木波贼犯洮州败绩,遁去”<sup>㉔</sup>。兴定二年,木波兵与南宋军合力攻金,“兴定二年,迁同知临洮府事。与提控洮州刺史纳兰记僧分兵伐宋。长寿由盐川镇进兵,宋人守戍者走保马头山,合诸部族兵来拒。长寿击败之,复破其援兵四千于荔川寨。即趋宕昌县。破宋兵二千于八斜谷,拔宕昌县,进攻西和州,先败其州兵。明日,木波兵三千与宋兵合,依川为阵,长寿奋击,宋兵入保城,坚壁不复出,长寿乃还。凡斩馘八千,获马二百余、牛羊三万,器械军实甚多”<sup>㉕</sup>。

木波叛金,令金朝的战马形势雪上加霜。兴定二年,彰化军节度使兼泾州管内观察使张行信至泾州后上书金宣宗,建议缓和同木波的关系,趁木波粮食歉收而廉价贸易其马匹以助军用:“马者甲兵之本,方军旅未息,马政不可缓也。臣自到泾,闻

陕右豪民多市于河州,转入内地,利盖百倍。及见省差买马官平凉府判官乌古论桓端市于洮州,以银百铤几得马千疋,云生羌木波诸部蕃族人户畜牧甚广。盖前所遣官或抑其直,或以势陵夺,遂失其和,且常患银少,所以不能多得也。又闻蕃地今秋薄收,鬻马得银辄以易粟。冬春之交必艰食,马价甚低。乞令所司辇银粟于洮、河等州,选委知蕃情、达时变如桓端者贸易之。若捐银万两,可得良马千疋,机会不可失,惟朝廷亟图之。”<sup>②6</sup> 木波在此之后有无再与金朝发生冲突,史无明载。金哀宗正大四年(1227),蒙古灭西夏后,直接威胁金朝陕西地区,金朝与木波的马匹贸易自不能顺利进行。

#### (四)金与夏宋战争时期的战马供应状况

西夏与金朝长期以来的矛盾最终导致双方在大安二年爆发战争。大安二年八月,“夏人侵葭州”<sup>②7</sup>。金朝在最初保持克制,贞祐二年八月,“丁未,夏人入边,命移文责之”<sup>②8</sup>。然而,西夏一方不断的进攻中断了双方马匹的正常贸易。贞祐二年,金宣宗询问平章政事术虎高琪:“往岁市马西夏,今肯市否?”高琪避而不答,却说:“木波畜马甚多,市之可得,括缘边部落马,亦不少矣。”<sup>②9</sup>可见当时金夏马匹贸易已经没有恢复的可能性了。

面对西夏进攻的咄咄态势,金朝决定给予还击,贞祐三年五月,“戊子,谋伐西夏,遣大臣镇抚京兆”<sup>③0</sup>。至此,金夏战争全面爆发,并最终延续到金哀宗正大元年。

在对西夏战争中,有这样一种现象:金朝一方多处于守城态势,而西夏多处于进攻态势,金军主要以步兵伏击西夏骑兵。这种现象在金宣宗南伐后,将主要骑兵投入到金宋战线后表现得尤为显著。金朝对马匹总是有所斩获,“大安三年,都城受围。夏人连陷邠、泾,陕西安抚司檄玉以凤翔总管判官为都统府募军,旬日得万人,与夏人战,败之,获牛马千余”<sup>③1</sup>;“贞祐四年十一月,夏人四万余骑围定西,辇致攻具,将取其城。合喜及杨斡烈等率兵鏖战走之,斩首二千级,俘数十人,获马八百余匹,器械称是,余悉遁去”<sup>③2</sup>;兴定三年,“未几,夏人复攻会州,行元帅府事石盏合喜发兵救未至,夏人移兵临洮,长寿伏精兵五千于定西险要间,败夏兵三万骑,杀千余人,获马数百”<sup>③3</sup>。

兴定元年四月,金宣宗以南宋岁币不至,命完颜赛不、乌古论庆寿等统军伐宋。同年五月,宋宁

宗也下诏北伐。金朝为逼迫南宋遵守“嘉定和议”<sup>③4</sup>,调集了当时所有能调集的力量对南宋发起了进攻。兴定元年十月,“庚戌,以将有事于宋,诏帅臣整厉师徒。辛亥,遣官括市民马,红赏格以示劝”<sup>③5</sup>。然而战争结果并没有朝着宣宗希望的方向发展。在宋军的顽强抵抗下,金宣宗速战速决的计划破产。兴定二年冬,宣宗趁金军在四川地区取得对宋优势时遣使使宋议和,但为宋所拒绝,“三年春正月庚午,吕子羽至淮,宋人不纳而还”<sup>③6</sup>。宣宗对于“侄国”南宋拒绝和谈恼羞成怒,乃连连下诏伐宋。“金宣宗南伐”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一直延续到金宣宗去世。金宣宗南伐开始后,金军在对宋作战中,或多或少地获得了一些南宋战马,但微不足道。如“兴定元年,与签枢密院事完颜赛不经略伐宋,败宋兵于泥河湾石壕村,斩首三千级,获马四百匹、牛三百头,器械称是”<sup>③7</sup>;“宋兵纵火而出,阿邻以骑兵邀之,遣步卒袭其后,宋兵败,生获吴筠及将校二百人,马数百匹,粮万石及兵甲衣袄”<sup>③8</sup>;“及泗州,宋兵八千围甚急,督众进战,大破之,溺水死者甚众,获马三百余匹,俘五十余人”<sup>③9</sup>。而且南宋“凡战马悉仰川、秦、广三边焉”<sup>④0</sup>,并不拥有优良战马,因此金军即便以所获南宋战马装备军队仍然很难抵抗蒙古军的进攻。并且金宣宗为避免金军士气涣散,严禁购买金军俘获之宋军战马。兴定三年正月,“甲午,有司请立价以买南征军士所获马,上恐失众心,因至败事,不听”<sup>④1</sup>。这就表明金朝的战马并未因对宋作战而得到补充。

金宣宗对西夏、南宋战争开始后,金朝的战马供应问题愈发严重。金军以本已十分有限之骑兵袭扰宋边,得不偿失。兴定三年十一月,朝中许多大臣已无马可乘,只好用毛驴代替,“乙未,以官驴借朝士之无马者乘之,仍给刍豆”<sup>④2</sup>。山东东路益都府张林起义后,行省蒙古纲所统骑兵不足,请求金宣宗派遣一千骑兵前来镇压,“是岁(兴定三年),益都桃林寨总领张林号‘张大刀’,据险为乱,自称安化军节度使。纲奏:‘林势甚张,乞遣河南马军千人,单州经略司以众接应’”<sup>④3</sup>。然而金朝马匹紧缺的情况并不仅见于此。兴定四年,参知政事李复亨巡视郡县官吏政绩时,上书宣宗论利害:“诏书令臣,民间差发可免者免之。民养驿马,此役最甚,使者求索百端,皆出养马之家,人多逃窜,职此之由。可依旧设回马官,使者食料皆官给之,岁终会计,

均赋于民。”<sup>④</sup>在战争中作为驿传用的马匹,金朝也交给广大农民蓄养,这些民户还需满足来往使者的苛刻要求,因此李复亨建议调整。但这种调整不外乎“均赋于民”,丝毫没有减轻广大农民负担的意愿。

#### (五)金军在对蒙作战中获取战马

除在对宋夏作战中能获取相当数量的战马外,宣宗时期金军在抗蒙战争中也能获取一定量的战马。兴定三年六月,辽州总领提控唐括狗儿率军收复太原府,参加此役的金寿阳令赵益“夜登其城,斩馘甚众,所获马仗不可计,护老幼二万余口以出”<sup>⑤</sup>。但这种获取是很少见的,金军遇到蒙古军往往溃散,“王师屡战屡衄,率皆自败。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将帅非才,既无靖难之谋,又无效死之节,外托持重之名,而内为自安之计,择骁果以自随,委疲懦以临阵,阵势稍动,望尘先奔,士卒从而大溃。朝廷不加诘问,辄为益兵。是以法度日紊,仓庾日虚,间井日凋,土地日蹙。自大驾南巡,远近相望,益无固志。吏任河北者以为不幸,逡巡退避,莫之敢前”<sup>⑥</sup>。这样的将士迎击强悍的蒙古军队,自然败多胜少。因此,金军在对蒙作战中俘获战马数量仍少得可怜。

### 二、哀宗时期战马供应的短缺

金哀宗在位(1224-1234)的十一年为金朝抗击蒙古进攻的最后时期,哀宗朝也是金朝战马供应最困难的时期。

#### (一)哀宗初期战马来源的变化

元光二年,金宣宗病死,金哀宗即位。哀宗改变乃父对外政策,实行对宋停战、联夏抗蒙。故而金末战马的获取来源与此前相比有所改变,集中表现在从对蒙战争中获取战马。正大元年九月,枢密判官移刺蒲阿收复泽州、潞州,“获马千疋”<sup>⑦</sup>。正大四年二月,移刺蒲阿、纥石烈牙吾塔统军收复平阳府,“执知府李七斤,获马八千”<sup>⑧</sup>。由于金哀宗与夏献宗议和为时过晚,所以尽管两国恢复了正常关系,但其时西夏正面对蒙古军队的凌厉攻势,已然自顾不暇,故西夏虽盛产马匹,然而双方的战马贸易仍旧不可能随关系正常化而恢复。而在哀宗对宋宣布“更不南伐”之后的正大二年十月,“移刺蒲阿及宋人战于光州,获马数千,数人千余而还”<sup>⑨</sup>。金朝还在与南宋的一些零星战斗中获得了少量战

马。综合看来,金朝的战马供应短缺仍无法改善。金军也在战斗中损失着大量战马。兴定五年(1221)十月,金军完颜合达部在延安府城东遭蒙古太师国王木华黎部伏击,大败,蒙古军“追斩七千级,获马八百匹”<sup>⑩</sup>。

#### (二)忠孝军战马问题

面对金蒙战争中金朝骑兵几乎伤亡殆尽的不利情况,大约在金宣宗元光年间,金廷开始着手重整骑兵,为此特别组建了“忠孝军”<sup>⑪</sup>,意欲打造一支类似于金初的骑兵队伍。但因金末战马严重不足,故忠孝军虽“人有从马”,但若丧失战马,则必须“以骑射选之乃得补”<sup>⑫</sup>,竞争方能得到战马补充,可见当时战马何其珍贵。也正因为如此,忠孝军作为金末战斗力最强的队伍,屡屡重创蒙古军,在大昌原、卫州、倒回谷等战役中,金军都依靠忠孝军取得了胜利。哀宗也对忠孝军给予优厚待遇,尽量保证忠孝军的马匹供应,如正大六年二月,“诏枢密更给忠孝军马疋,以渐调发都尉司步卒及忠孝马军屯京西”<sup>⑬</sup>。

然而随着战事的发展,忠孝军的战马等补给也越来越困难。正大九年(天兴元年,1232)正月,金军在金蒙三峰山会战、钧州会战中大败,完颜陈和尚、高英、樊泽等一大批将领阵亡,此后忠孝军群龙无首,再加上补给困难,已经失去了作为金军主力的价值。金朝重整骑兵的努力终归失败。

#### (三)金亡前夕的战马供应

正大八年九月,蒙古窝阔台亲统大军进攻金河中府,别遣拖雷统四万骑兵自凤翔、宝鸡南下,借宋道迂回进入金朝南部,自唐、邓攻汴京。十一月,蒙古军拖雷部抵饶峰关,由金州而东。哀宗急令移刺蒲阿、完颜合达统两省军南下屯于襄、邓准备堵截之。十二月,拖雷率军渡过汉江,与金军战于禹山,不利,乃以小部吸引住金军,主力直趋汴京。金军惧其乘虚偷袭京城,全军匆忙入援。正大九年(天兴元年)正月,“癸未,大军发邓州,趋京师,骑二万,步十三万”<sup>⑭</sup>。拖雷此举使得金蒙两军形势就此逆转。蒙古军拖雷部骑兵约三万余,较金军骑兵为多,且比金军先行,故蒙古骑兵有充分的时间在邓州通往汴京的路上设伏对金军加以打击。同时,拖雷留三千骑尾随金两省军以为牵制。“以逸待劳”的优势由金军转入蒙古军方面。金军且战且行,沿途又因被蒙古军抢掠一空而无所食,疲惫饥

饿随之而来。南北两路蒙古军汇合后,最终在钧州三峰山会战中彻底击败两省军。

从两省军在禹山击败蒙古军到三峰山战役彻底崩溃,骑兵是决定战争发生转折的重要条件。金朝末期战马剧缺,并无足够骑兵与蒙古军作战。移刺蒲阿忘记“敌半涉水击必胜”<sup>⑤</sup>的军事经验,放任蒙古军顺利渡过汉江,企图全歼蒙古军于背水,犯下了严重错误。他忽视了蒙古骑兵众多,机动性强于金军的这一优势。而拖雷则巧妙利用了己方这一优势,渡水后果断摆脱与两省军纠缠,向汴京急进,攻其必救,迫使金军由主动转入被动,往来疲于奔命。此举为拖雷部蒙古军与北部主力的汇合赢得了时间,半路对金军的尾随追击也打击了金军的士气,最终在三峰山一战功成。

经过三峰山、钧州战役,金军主力几乎完全被歼,精兵良将丧失殆尽,蒙古军乃进围汴京。汴京被蒙古军围困后,金朝几乎没有找不到可以投入作战的战马。天兴元年六月,因汴京被围日久,城中乏粮,哀宗遂“阅官马,择瘠者杀以食”<sup>⑥</sup>;闰九月,“辛亥,遣张开、温撒辛、刘益、高显率步军护陈留、通许粮道”<sup>⑦</sup>。保护粮道这样重要的军事任务竟然只能派步兵去完成,金末战马短缺的情况可见一斑。同年冬,汴京城内仅有“官奴统马兵三百”、“刘益将步兵五千”<sup>⑧</sup>,金朝骑兵仅余数百,“骑兵”已经名存实亡。天兴二年六月,金哀宗在逃往蔡州途中路过亳州时,“从者二三百人,马五十余匹而已”<sup>⑨</sup>。哀宗遣人往息州括马,却仅“得马二百”<sup>⑩</sup>。七月,已经逃至蔡州的金哀宗“定进马迁赏格。每甲马一匹或二匹以上,迁赏有差。自是,西山帅臣范真、姬汝作等各以马进,凡得千余匹,以抹拈阿典领之”<sup>⑪</sup>。天兴二年十二月,蔡州城内的哀宗突围不成,于是杀马犒赏军士,“乙未,杀尚厩马五十匹、官马百五十匹分犒将士。尚厩饲马止十匹,百官唯执政四五人与都弹压移失刺乘马,余皆徒行矣”<sup>⑫</sup>。

### 三、结语

金章宗泰和六年,铁木真在斡难河源建立大蒙古国,金朝的西北方出现了一支日后称雄于亚欧大陆的新兴骑兵力量。随着金军对蒙古军作战的节节失利,金朝丧失了广袤的牧马之地,只有蜷缩于陕西、河南一狭小之地。马匹极为短缺,金朝

已经几乎无力对功臣赏赐战马,偶有的几次赏赐也是十分难得。正大六年九月,“洮、河、兰、会元帅颜盏虾虫麻进西马二疋,诏曰:‘卿武艺超绝,此马可充战用,朕乘岂能尽其力。既入进,即尚厩物也,今以赐卿,其悉朕意’”<sup>⑬</sup>;正大七年十月,完颜合达与移刺蒲阿解卫州之围,金哀宗“登承天门犒军,皆授世袭谋克,赐良马玉带,全给月俸本色,盖异恩也”<sup>⑭</sup>。至金亡前夕,粮食成为稀缺物品,故金廷赏赐军士麦子而非战马以示鼓励。<sup>⑮</sup> 尽管金朝统治者千方百计地设法维持战马供应,但终究已是日薄西山,后劲不足,金亡前夕,朝廷几乎没有战马。究其根本原因,金末战马不足的结局在金初便已埋下伏笔。与东胡系的鲜卑、契丹、蒙古属于狩猎——草原文化民族不同的是,女真(女真先世称肃慎、挹娄、勿吉、靺鞨,此处皆以“女真”代称)属于渔猎文化民族,<sup>⑯</sup> 养马本非其专长。女真族建立金朝后,自始至终都没能探索到一条适合本民族的养马之路,不得不依赖契丹人。这也是为何金朝群牧所养马者绝大多数为契丹人的原因。自身先天条件不足,却又不重视外界弥补,与周边民族政权关系紧张,使得战马资源从立国伊始便埋下了供应短缺的种子。金初,金朝对蒙古部作战失利,此后蒙古一直是困扰金朝北边的主要因素。金初灭辽、灭北宋,因处理民族关系不当,极大地伤害了汉族人民的感情。金朝境内的契丹人反叛、南宋的敌对行为始终不曾中断,与西北的夏国也是矛盾重重。金朝四面树敌,专以武力立国,一旦其武力不足以继续维持国势便只能速亡。金末战马供应的短缺仅仅是这一根本原因的表象而已。

### [注 释]

①②②⑦ 《金史》卷 13《卫绍王纪》。

③⑤ 《元史》卷 1《太祖纪》。

④ 《元史》卷 122《梁直膺鲁华传》。

⑥ 金朝此时还掌握着东北一部分辽东地区,但因中都被蒙古军攻占,金朝辽东与中原的交通咽喉被割断,这一地区实际上处于一种独自为政的状态,金朝中央只能以诰命的方式命令辽东当地大臣行省辽东,而未能从中央派出人员行省辽东。

⑦⑧⑨⑩⑫⑬⑭ 《金史》卷 14《宣宗纪上》。

⑪ 《金史》卷 122《忠义二·从坦传》。

⑬ 王曾瑜:《金朝军制》,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4年,第151页。

⑭⑯《金史》卷27《河渠志》。

⑮ 和希格:《论金代黄河之泛滥及其治理》,《内蒙古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第7-12页。

⑰《金史》卷46《食货志一》。

⑱《金史》卷14《宣宗纪上》,贞祐三年七月,“辛酉,议括官田及牧马地以贍河北军户之徙河南者,已为民佃者俟获毕日付之。群臣迭言其不便,遂寝”。同卷,第313页,贞祐三年十月,“丁亥,尚书右丞汝砺言:‘河北军户之徙河南省,宜以系官间田及牧马草地之可耕者赐之,使自耕以食,而罢其月粮。’上从其请。命右司谏冯开随处按视,人给三十亩”。同卷,第315页,贞祐三年十一月,“庚午,上与尚书右丞汝砺商略遣官括田赐军之利害,汝砺言不便者数端。乃诏有司罢其令,仍给军粮之半,其半给诣实之价。……庚辰,上谓宰臣曰:‘朕恐括地扰民,罢其令矣。官荒牧马地军户愿耕者听,已为民承种者勿夺。’”

⑲《金史》卷107《高汝砺传》:“在官荒田及牧马地,民多私耕者。”高汝砺指出了当时河南土地的分配情况,河南没有足够的土地繁育马匹。

⑳《金史》卷44《兵志》。

㉑《金史》卷104《蒲察移刺都传》。

㉒《金史》卷16《宣宗下》。

㉓⑳《金史》卷107《张行信传》。

㉔㉕㉖㉗㉘《金史》卷15《宣宗纪中》。

㉙《金史》卷103《乌古论长寿传》。

㉚《金史》卷106《术虎高琪传》。

㉛《金史》卷110《韩玉传》。

㉜㉝《金史》卷113《赤盏合喜传》。

㉞ 关于“金宣宗南伐”的目的,笔者认为其目的有一个变化过程,最终目的为逼迫南宋继续遵守“嘉定和议”,继续对金交纳岁币。

㉟《金史》卷101《乌古论庆寿传》。

㊱《金史》卷103《完颜阿邻传》。

㊲《金史》卷111《纥石烈牙吾塔传》。

㊳(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60《兵考十二》。又

见于《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8《孳生监牧》,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432-433页,“故凡国之战马,悉仰川、秦、广三边焉”。

㊴《金史》卷102《蒙古纲传》。

㊵《金史》卷100《李复亨传》。

㊶《金史》卷15《宣宗纪中》;《金史》卷122《赵益传》。

㊷《金史》卷106《刘炳传》。

㊸㊹㊺㊻㊼《金史》卷17《哀宗纪上》。

㊽《金史》卷17《哀宗纪上》。按,《纥石烈牙吾塔传》作“获马三千”。

㊾(元)苏天爵:《元名臣事略》卷1《太师鲁国忠武王》,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7页。

㊿ 关于金末忠孝军的研究,参见李浩楠:《论金代的忠孝军》,《北方文物》2008年第2期,第74-79页。

①《金史》卷113《赤盏合喜传》。

②《金史》卷112《移刺蒲阿传》。

③(唐)杜佑:《通典》卷160《兵十三》。

④《金史》卷18《哀宗纪下》。

⑤《金史》卷114《石抹世绩传》。

⑥⑦《金史》卷119《乌古论镐传》。

⑧《金史》卷119《完颜仲德传》。又见《汝南遗事》卷2,天兴二年七月丁卯条;《金史》卷17《哀宗纪上》。按,“抹拈阿典”当作“抹拈兀典”。

⑨(元)王鹗:《汝南遗事》卷4,天兴二年十二月乙未条。

⑩《金史》卷112《完颜合达传》。

⑪《金史》卷18《哀宗纪下》:“(天兴二年十月)辛卯,上阅射于子城,中者赏麦有差。……戊戌,赐义军战歿被创者麦。”

⑫ 参见景体谓、景超:《东北亚古代民族文化的类型与特征论析》,《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第85-88页。

责任编辑:薛海波